

捻军史论丛

江 地

人民出版社

K254.4107

1
2

捻军史论丛

江 地



人 民 出 版 社



A-880611

封面设计：王师颉

论军史论丛

江 地

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00,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650

书号11001·449 定价1.30元

前　　言

这是作者二十多年前所出版的两本著作的合并再版，即1956年的《捻军史初探》和1959年的《初期捻军史论丛》（原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次再版时，书名改为《捻军史论丛》，在内容上只去掉了原书中《介绍几种捻军史资料》一文，增加了两幅地图和一篇叫做《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的文章，其它则一仍旧贯，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加了一些注释、补记和改了两个题目。从《论捻党》起到《论西捻军的抗清斗争》止，这十篇论文，每篇既是独立的，在时间上又是互相衔接的，连接起来，它把捻军起义从产生、发展到败灭的全过程，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实际上是一部以论文形式写成的捻军史，反映出捻军起义的全貌。《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放在它的后边，是因为这里总结了捻军史的几个问题，特别是最后讲到了捻军战争的历史意义，犹如本书的结论，作为收尾是合适的。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也是重要部分。第二部分，有的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抗清斗争，有的是分期和资料问题，末附以捻军大事年表，算是用另一种形式，把捻军起义的始末，向读者交待清楚。

感谢一些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帮助与支持，使此书得以重新和读者见面，为了把中国近代史这门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空白点填补起来，这本书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太阳既出，爝火自灭，待一部科学而又系统的捻军史出版之日，此书就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江　地

1980年8月于太原山西大学历史系

目 录

前 言

论捻党(1808年—1853年)	1
论太平天国北伐战争(1853年5月—1855年5月)	35
——兼论初期捻军的抗清斗争	
论初期捻军战争(1853年—1857年)	67
淮南时期的捻军战争(1857年—1858年)	99
论淮河流域的捻军战争(1858年5月—1861年12月)	118
皖北根据地失守与张乐行殉难(1862年—1863年)	171
论太平天国西北战争(1862年—1864年)	189
论后期捻军战争(1864年—1866年)	207
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1866年—1868年)	227
论西捻军的抗清斗争(1866年—1868年)	253
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	287
幅军(1851年—1863年)	323
关于捻军史分期问题	336
关于捻军史的参考资料问题	340
附录：捻军史大事年表(1808年—1900年)	351
捻军战争形势图(1851年—1868年)	252—253
东捻军和西捻军进军路线图(1866年—1868年)	252—253

论 捻 党

(1808年—1853年)

根据捻党、捻军抗清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从1808年即嘉庆十三年起，到1853年即咸丰三年止，这四十五年是捻党时期；从1853年起，到1868年即同治七年止，这十五年是捻军时期，合计约共六十年，是为“捻史”的全部历程。当然，在1808年前的捻党和1868年后的捻军，也还有过零星的抗清斗争，不过，已经不是历史的主流，故不计算在内^①。

捻党和捻军是相互联系着的，即捻党是捻军的先驱，捻军是捻党的发展；捻党运动是捻军战争的准备时期，捻军战争是捻党运动的最高斗争形式。但是，它们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即捻党是农民运动，捻军是农民起义；捻党是反清结社，捻军是抗清战争；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捻军是太平天国的盟友。可以说，它们的区别，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与革命战争、或群众组织与战斗单位的区别。

① 1869年(同治八年)直隶大名、河南安阳、山东曹州等地，仍有捻军余部活动，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曾派兵督剿；大约在1871年(同治十年)，张宗禹叔父张特膳，任柱弟弟任汶和张昆(河南息县捻首)等，曾逃往河南固始叛徒李昭寿家避难；1872年(同治十一年)，捻党李四、张振科等在豫皖边界聚众起义，被安徽巡抚英翰击败；1876年(光绪二年)，安徽涡阳有捻党旷同、席小猴等组织起义；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安徽涡阳、蒙城有捻党刘疙瘩、阎广远、牛世修等组织起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南汝南捻党晏得仁等在当年陈大喜起义地区组织抗清斗争，并与清军作战。再根据捻党和义和团的历史关系来看，捻军斗争在1868年(同治七年)失败以后，零星的活动仍然继续了三十二年，即一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如果按照这个材料计算，则捻军历史将有大约整整一百年的历程。

由于史料极为缺乏，目前要想对捻党运动四十五年的全部史实加以论述，还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仅仅根据业已搜集到的一些材料，提出几个问题来加以初步探讨，以说明捻党运动的某些侧面或某些特征，即使这样，资料也还是不够的，说明也还是简略的，希望研究此问题的同志们给以补充和指正。

一 关于捻党的产生

研究捻史，首先碰到的难题，是捻党究竟从何时产生即何年开始的问题，这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完满的解决，却可以初步的解决。

捻党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即十七世纪中叶。王闿运说：“捻之为寇，盖始于山东。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盖始于康熙时。”^① 他把捻党产生地点说成山东是错误的，因为所有资料都说捻党发源于皖北，说得确切些，应该是“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之徐；山东之兖、沂、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颍、泗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②

但是，王氏把捻党和幅党的产生确定在康熙年间，却不能说毫无根据。因为康熙年间，中国大陆上东南、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均已先后败灭，清朝的反动统治，已经得到暂时的稳定，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使以反清复明、兴汉灭满为职志的义士们感到，斗争方式必须转变，即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城市转入农村，由上层士大夫转入下层千百万农民群众，才能扎下根基，继续顽强的斗争。所以，康熙十三年（1674），天地会在福建成立，乾隆年间（1736—1795）哥老会诞生，曾经反抗蒙元统治的白莲教，也在这期间转向

① 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一册，一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首卷《序言》。

清朝斗争。这样看来，作为反清结社之一，而且和白莲教有着历史联系的捻党，在这期间诞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关于捻党在康熙年间的情况，目前尚无其它资料可证，所以，还不能作为定论。循此线索下寻，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即乾隆二十年（1755），我们又找到一点端倪了。据《清高宗圣训》卷二五四说：

“徐州萧县地方，有顺刀会名色，每逢庙会集场，压宝打架（？），酗酒诱赌（？），臣前在河南布政使任内，永城县有此会名色，严行查禁。今徐州与永城接壤，又有此会，明系豫省窜入等语。徐属民情强悍，匪案素多，又与豫省接壤，犬牙相错之处，尤易藏奸。……顺刀会一案，虽经该县拿获，审无结党聚众实迹，然非严行查禁，则棍徒结聚日多……”

顺刀会活动的徐州、永城，正是捻党发源地，人人带刀一柄，到处结党聚众、劫富济贫，也是萌芽时期捻党的特色。可以说，顺刀会是捻党的先驱，或者说它是和捻党相类似的群众组织。这里，我们继续顺着顺刀会的线索探寻。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清高宗圣训》卷二五四里，又提到顺刀会说：

“近来，河南、江南、山东连界地方，有顺刀会名色，……近闻该处奸徒结会聚众，但有顺刀一柄，便许入伙，呼朋引类，十百成众，或逞凶打降，或使刀逼胁，……或抢掠财物，种种不法，深为蠹害……”。

把顺刀会这种情况，和《蒋子潇先生遗集》、《星烈日记汇要》等资料中关于初期捻党情况相比拟，证明完全是一种类型，情况是极其酷似的。但要证明顺刀会就是捻党，也还需要再加找寻。

嘉庆十三年（1808），上谕里又说：“据称近日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带地

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欺压良善。”^①

由此可见，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等名目虽异，来源却同，他们同源于“拽刀聚众”的原始组织。根据《清实录》和有关捻党其它资料证明，“拽刀聚众”的人亦被分别叫做“拽匪”、“掖匪”、“拽刀手”、“掖刀手”、“曳刀手”等名目。关于这方面，陶澍在其文集中说的很清楚：

“……江苏省徐、邳、淮、海一带，与皖、豫、山东等处犬牙相错，匪徒恶棍出没其间，兼之民俗强悍，以佩刀执械为能事，伤人酿命之案，倍于他处。……查此等匪棍，其始亦不过寻常游手任性而行，漫无拘束，渐至三五联络，借端吓诈，稍有睚眦，即拔刀相向，庸懦畏势，不敢与较，以致益鸣得意，愈肆横行，久之遂成拽刀渠恶。”^②

陶澍是清廷大吏中第一个注意并调查过捻党情况的人，因此，这里所叙述的拽刀会或拽刀手的由来，虽然极尽诬蔑曲解之能事，却总算告诉了我们：起初只是一些“以佩刀执械为能事”的游民群众，时间长了，便“渐至三五联络”，终于结党聚众地发展成有一定群众基础和原始性组织的“拽刀会”，这种掖刀会虽然极其原始和散漫，但它却是许多著名组织如捻党、义和拳等的渊源。

掖刀会既无严密组织，也无固定领袖，因此，其名称和特点，便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条件下，而逐渐不相同了。它出现了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等名称，既是义和拳的来源，又是白莲教的混合。后来，再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大致向三个方向发展：向北的一派和白莲教混合，形成白莲教及其各支派；山东的一派，仍以义和拳名义活动，后来成了义和团；仍在苏鲁豫皖四省边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九，《义和团》第四册，四三三页。

②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清将徐海匪徒锁系铁杆折子》。

界的一部分，有的叫掖刀会，有的叫顺刀会，有的叫捻党，有的叫幅党，有的就成了“盐枭”。到了嘉庆年间，特别是道光年间，他们又逐渐总汇成一个巨大的反清结社——捻党。捻党就是这样逐渐形成、逐渐产生的。

捻党的产生，我们所以把它暂定为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是由于这时官书上才有了正式的记载，而且，它和掖刀会被摆在一起了：

“豫省界连湖北之处，有红胡子、白撞手，其与安徽、山东接壤处，又有掖刀会名目，……”^①

红胡子、白撞手、掖刀会都是捻党在不同地区的称呼，在清廷官吏的奏折中，这些组织名称往往互相混淆不清，一方面是因为奴才们根本弄不清楚，一方面是因为来源相同。其所以叫做“红胡子”，是因为捻党曾经“涂面执械”地向地主豪绅进攻；其所以叫做“白撞手”，是因为这些贫苦群众，都是地无一寸、房无一间，他们就以粗暴的反抗，来白白地“吃大户”；其所以叫做“掖刀会”，是因为它来源于“拽刀渠恶”，他们就以这样简单的组织和简单的武器（一把刀），来进攻富豪并保卫自己。从这些对于捻党的诬蔑称呼中，既反映出捻党运动初期的原始气质，也反映出捻党运动的本质，即它是城乡贫苦群众的反封建组织。

在有些地方，以“红胡子”来诬称捻党，这在地主阶级中很流传过一个相当时期，关于红胡子就是捻党的记载很多，兹举两例为证：

“初，发逆之北犯也，楚氛既恶，密迩豫疆，豫中不群逞之徒啸聚萑符，名曰捻匪，即俗所称红胡子也，四起而为之应。”^②

① 《清仁宗圣训》卷九九，三〇页。

② 郑元善：《宦豫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一册，三三〇页）。

“贼意得而凶，益横，竟明火执械，攻劫庄村，……然犹以夜，且墨面朱须，恐人认识，似尚有畏法之心，时遂有‘红胡子’之俗称也。”①

这种诬称，大致初在鄂豫边区流行，后来流传到鲁南和皖北，以后捻党之名出现，地主官吏亦改称“捻匪”，在广大群众中，一般传统称呼是“捻”或“捻子”。

总之，捻党最初产生可能在十七世纪中叶即康熙年间，但确切见之史料，则在十九世纪初叶即嘉庆十三年（1808）。捻党产生的地点在苏、鲁、豫、皖、鄂五省，而最初发源地仍然和捻军一样，是皖北淝水、涡河流域。捻党与八卦教、义和拳同出一源，即来源自掖刀会，但后来则分道扬镳：八卦教和白莲教结合，成为北方反清力量；捻党与“盐枭”结合，成为中部反清力量；义和拳和虎尾鞭结合，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爆发了伟大的义和团运动。这些组织在萌芽时期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并互相混淆而难以辨别，只有到了后来，才各自走上独立的道路，具有独特的色彩。

二 捻党和白莲教的关系

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和白莲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

捻党和义和拳一样，不仅与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同出一源，而且，它最初的成员，有一部分是白莲教反清战争后逃亡的白莲教徒，也有一部分是反白莲教战争中清廷所裁撤掉的皖北籍乡勇，因此，捻党的产生和发展，与1796—1804年（嘉庆元年——嘉庆九年）的白莲教川楚陕大起义有密切的关系。

捻党产生以后，捻党成员又和白莲教徒一同组织过抗清起义，

①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一册，三〇九页）。

起义失败后，他们又一同遭受清廷残酷压迫的种种苦难。捻军起义以后，白莲教徒又在各地组织起义加以支援，并参加捻军进行领导，有的捻军领袖兼有白莲教教主的双重身份。由于白莲教有优秀的抵抗异族侵略的传统，因此，捻军起义以后，曾借用白莲教的旗帜，借用他们的称号、方法和斗争经验。

以下，我们用若干材料来说明这种情形。

陶澍说：

“查红胡子原系白莲教匪漏网之人，间出偷窃，身带小刀为防身之具，人以其凶猛，故取戏剧中好勇斗狠而挂红胡者名之。”^①

黄钧宰说：

“惟安徽之庐、凤、颍、亳，河南之南、汝、光、陈，响有白莲遗党，劫掠最横，以朱染须，号曰红胡匪。”^②

由此可见，嘉庆年间白莲教、天理教两次起义失败后，不仅给清廷政权以极大震动，使清王朝的威力由顶点急剧下降，而且，由于起义失败，白莲教徒有几十万被杀，天理教徒被杀者亦达二万余人，这也就使这一反清结社，受到极大摧残。在严重镇压的恐怖气氛下，使用原有白莲教名义进行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白莲教徒不得不隐蔽下来，不得不另以新的组织形式和名义，继续进行活动，而捻党这一组织形式，也就成为“劫后余生”的白莲教徒的最好活动形式，这些人便成为最初的一批捻党成员。

方玉润说：

“捻之始，起于嘉庆二年（1797）。楚川教匪滋扰，在处招募乡勇，其时颍、汝岁歉，应募者众。数年，教匪底定，撤勇归籍。若辈久历戎行，……既归，不屑生业，……日则市场横恣，夜则乡村行

①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

②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四，一四页。

窃，……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捻子之称，盖由此起。”^①

这就是说，捻党组成之后，其参加者不但有白莲教徒，而且有反白莲教战争后的裁撤乡勇。这正如太平天国失败后，被裁撤的曾国藩湘勇加入哥老会一样，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出身的乡勇，其由统治阶级工具，转变为反清结社的积极力量，对于吸收有大批游民成份的捻党捻组织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历史上来看，捻军故乡的淮河北岸，却是元末白莲教起义的根据地。早在1344年（至正四年），白莲教领袖彭莹玉、刘福通等在这里进行过地下抗元运动；1351年（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两岸是他的红巾军主力所在地；1355年（至正十五年），白莲教首领韩林儿在亳州登基，建元龙凤。由此可见，捻党故乡就是白莲教的故乡，我们说捻党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捻党产生以后，到了道光二年（1822），曾经和白莲教共同组织过一次起义，即朱凤阁、邢名章起义。关于这次起义，《清史列传》卷三四《孙玉庭传》说：

“河南新蔡教匪朱凤阁（即朱麻子），与安徽阜阳教匪邢名章，自新蔡起事，突入安徽颍州境。”

他们为什么要进入安徽颍州境内呢？因为那里是捻党活跃的地区，他们必须与捻党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起义的群众。关于这一点，《清宣宗实录》卷四一说得很清楚：

“豫省教匪朱麻子等，由新蔡纠众窜入阜阳（颍州）滋事，若非颍属匪徒勾结，该犯等何敢轻入其乡。查颍州强悍成风，为匪党逃

①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一册，三〇九页）。

逋渊薮，向有捻匪私巢，虽非习教传徒，声势最易联络。风闻艾亭集在阜阳县西南距城一百六十里，捻匪最多，即朱麻子等犯窜匿之所。艾亭集北十五里有马家店……盗首马皮显即马二，系该处捻头，伙党殆难数计。县西……桃花店……韦家寨……地里城，……捻匪、盐枭成群结党，最为地方之害。……若不早拿，恐习教之徒伏而未动者，与捻匪互相纠结滋事。”

在共同组织的起义失败后，捻党成员和白莲教成员，又一同潜伏地下，或一同受苦受难。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父亲麟庆，在道光十年（1830）任河南按察使时写道：

“庚寅春（指道光十年）……查巡抚杨莅任以来，督属缉获捻匪王发魁等二百十五名，盗犯谢添顺等一百三名，匪犯邢名顺等一百十名，……本司在道任，督缉教匪聂士贞等五十四名，自正月至今，又获捻盗五十余名。”^①

在清廷官吏奏折中，白莲教徒与捻党成员一同被捕被杀的材料很多，由于昏庸的大吏们也区别不清，因此，在这个史料中被称为“教匪”的，在另一史料中则称之为“捻匪”，有些干脆一律诬之为“土匪”，这些就说明了在嘉道时期，捻党与白莲教的组织是相通的，其成员兼具双重身份者也大有人在。

值得注意的是捻军起义以后，在1855年（咸丰五年）的雉河集会议时，曾建立国号为“大汉”，其领袖张乐行并有“大汉明命王”的称号^②。我们知道，白莲教起义领袖多自称“明王”，如元末韩山童自称“明王”，韩林儿自称“小明王”，明永乐时，金刚奴自称“汉明皇帝”，接受过白莲教领导的朱元璋，后来在建国号时也叫做“明朝”。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有代表一切好势力的“明”和代表一切坏势

^① 麟庆：《雪鸿因缘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一册，三一五页）。

^② 汪士铎：《汪梅翁乙丙日记》，卷三，三二页；尹耕云等：《豫军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二册，三〇一页）。

力的“暗”，这就是说，“明”象征农民起义，“暗”象征封建王朝统治，明暗相争而明终胜利，则表达出农民推翻封建反动王朝统治的理想和愿望。

捻军国号“大汉”，张乐行称号“大汉明命王”。“大汉”是当时农民战争中“兴汉灭满”思想的反映，是反抗异民族侵略、具有民族斗争意义的口号，这是白莲教长期进行反异族侵略思想，在捻军及其领袖方面的反映。更明显的是张乐行的“明命王”，与“明王”、“小明王”、“汉明皇帝”的称号如出一辙，可知捻党是借用了白莲教教义和斗争纲领。这一方面说明捻党是白莲教的盟友，曾经从白莲教借用了抵抗异族侵略的教义和经验；另一方面也说明，捻党的抗清运动，从开始时期就具有相当政治色彩，它是一个政治性的反清结社。反动地主官吏诬之为“饥穷乌合之徒”，说它“无名号相统摄，恣为剽盗而已”，正表现了他们的愚蠢和反动本质。

捻军有个革命领袖叫刘玉渊（即刘狗），绰号“二老渊”，雉河集会议时为八卦旗旗主，捻军一般为五色旗或五色镶边旗，只有他的八卦旗是特殊的，因为是从八卦教借用的旗帜。刘玉渊又是白莲教徒，因为在1862年（同治元年）时，他曾和河南商丘金楼寨的白莲教军合作过，共同进行抗清起义：

“[商丘金楼寨]寨首郜永清，其先习白莲教已三世矣，为离卦大宗。海内承平，守令仅以邪教诛首恶，永清之祖父皆伏法，而子孙幸邀宽典。永清不悛，乘中原多故，其教中徒众有为皖捻堂主者，志益侈。……八卦旗捻首刘狗至金楼谒永清，执礼甚恭，薪木无毁伤。……（并）约皖捻王明、李永年入其寨……会刘狗以马步贼二万来援，……贼立八卦旗，志甚得，无馁意。”^①

^① 尹耕云等：《豫军纪略》卷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第二册，一八九页）。文中所说堂主，是对捻首的一种别称。为什么叫头领为堂主呢？原来这是淮北方言，应作趟主。当捻军出发打粮时，每出发一趟，其领队之人就被叫做趟主，小头领每趟都有调换，并非固定一人。史料中全部作堂主，那是以讹传讹，本义也就不明了。

根据嘉庆二十年那彦成的奏疏来看，早在乾隆年间，河南商丘郜生文便是白莲教支派离卦教的大首领，长江流域地区的白莲教支派如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等都由他统辖，教徒尊之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他的离卦教和林清在北方领导的坎卦教、王中在山东领导的震卦教一样，是白莲教中重要一派，具有极大的潜在力量^①。郜永清既为离卦大宗，父祖三世均习白莲教，金楼寨起义是捻军时期一次著名的白莲教起义，因此，他可能是郜生文的后代。

郜永清的教徒，有些人参加了捻军在皖北的起义，刘玉渊便是最典型的一位，而且，他又兼具捻军著名领袖的身份，唯他的旗帜却与一般捻军不同，是金楼寨方面同样的八卦旗，以带领几万捻军的领袖，见了郜永清却“执礼甚恭”，而军纪又“薪木无毁伤”，可想而知白莲教与捻军的深厚关系。

由捻党、捻军和白莲教的关系，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一段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 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

捻党运动正是借用了白莲教的战斗口号和服装，又在新的历

①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九，《义和团》第四册，四三四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史条件下，揉和进新的成份和血液，用以展开新的场面并发动新的斗争。捻党之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赞美新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斗争；是为了提高某一任务在想象中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亡灵重行游荡起来。”①

三 “捻”的解释和捻党的某些特征

关于捻党或捻军的“捻”，究竟应作如何解释，是一个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有待于实地调查和研究，目前，只能就所有关于本问题的资料中，选择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意见，作为初步的结论。

关于“捻”的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成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群聚为捻”。例如，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陶澍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② 和他的说法一样的是《清实录》和《东华录》，这一股为一捻，就是聚集一部分群众，进行抗清活动就叫捻。

和陶澍相同的说法是方玉润，他说：“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③

关于这种解释，接近真实，也较为可靠的，是王大球在《张乐行传略》中的解释：

“满清末年，黄淮之间，称一部分人为一捻子，后来，逐渐转变，有时称为一股，有时称为一杆。一捻，一股，一杆意义完全相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

③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十卷，有同治十二年陇东分署刻鸿藻室丛书本，其日记手稿本存北京图书馆。